

哈佛告诉你

陈祖芬

泰坦尼克号下沉时,游客们逃到甲板上拥向小船,偏有一个叫威德纳的青年逆向而行奋力返回船舱,仅仅是为了抢救一本弗朗西斯·培根的散文集。威德纳和散文集和泰坦尼克号一起下沉了。这个爱书胜过生命的青年人是哈佛的学生。

威德纳的母亲就是泰坦尼克号那位幸存的太太。老太太以威德纳的名义给哈佛捐助一座图书馆。这座威德纳图书馆是哈佛最大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图书馆,仅图书有345万多册。图书馆正门两侧各有一块石碑,分别刻着这样的碑文:

“威德纳是哈佛大学毕业生。在泰坦尼克号沉没时去世的。他生于1885年6月3日,死于1912年4月12日。”

“这座图书馆是威德纳的母亲捐赠的,这是爱的纪念。1915年6月24日。”

哈佛的毕业生有一个传统:捐助哈佛。哈佛的资金三分之一来自捐助。很多学生的家长,也都是哈佛校友哈佛人。一代一代的哈佛人,进入社会上层又把财富回馈给母校哈佛。每年的捐款,是哈佛收入的重要部分。

给予往往是相互的。是先有哈佛的给予还是先有给予哈佛,这个问题或如鸡生蛋还是蛋生鸡那样说不清。或者只有让哈佛告诉你。

哈佛没有高楼大厦,只有新英格兰的红砖墙。即使诺贝尔奖获得者也不不过在校园有一个决不起眼的停车位。毕竟哈佛最起眼的是一00座图书馆,尤其是一个个像图书馆那样的人,或者说,一个人就是一座图书馆。哈佛或哈佛人是不需要任何包

装的。有人称史华慈是哈佛的一位类似东方的大儒,在他动过癌症手术的82岁高龄的时候,依然天天早上按时去办公室工作,即使有时要倒下。而他办公室里挂大衣的两个衣架,竟是用铁丝胡乱缠绕而成的。

某教授对学生说,你学我这门课,你就一天只能睡两小时。学生想,那么,我学四门课,我就没有睡眠时间了,我就得倒贴睡眠时间了。

哈佛的博士生,可能每3天要啃下一本大书,每本几百页,还要交上阅读报告。哈佛过桥便是波士顿,前人类学系主任张光直在哈佛读博士那几年,没有上过桥没有去过波士顿。

哈佛学生或是哈佛教授,首先不是一份荣誉,而是一种证明。

人到底可以有怎样的意志力,人到底可以有怎样的发挥潜力?哈佛告诉你。

哈佛是一种象征,最高智慧的象征,最高学府的象征。

人的意志,人的才情,人的理想,为什么在哈佛能兑现?哈佛告诉你。

哈佛的学生餐厅,很难听到说话的声音,每个学生端着比萨可乐坐下后,往往顺手把大衣扔地上,然后边吃边看书或是做笔记。我就没见过哪个学生光吃不读的,更没见过哪个学生边吃边闲聊的。感觉里,餐厅不过是一个可以吃东西的图书馆,是哈佛正宗100个图书馆之外的另类图书馆。

哈佛的医院,同样地宁静,同样地不管有多少候诊的人也无人说话,无一人不在阅读或记录。医院实

在也只是图书馆的延伸。

于是——哈佛产的诺贝尔奖得主有33位。

哈佛产的美国总统有7位。哈佛校园里,不见华服,不见化妆,更不见晃晃荡荡,只有匆匆的脚步,坚定地写下人生的篇章。哈佛不是神话,哈佛只是一个证明,人的意志、精神、怀抱、理想的证明。

在美国,行人是有序地听从红绿灯指挥的,除了哈佛校园。哈佛人不相信红绿灯,只相信自己是重要的,自己的每一分钟都是重要的,见缝插针地快步过马路,旁若无人,旁若无车。

哈佛的学费不是一般家庭负担得起的。哈佛校园里,恐怕有相当部分的学生,他们为每一课交上美金,但是不拿学位。这也是看哈佛收入的可观的部分。不过你看不出那些学生是可以得到学位的,哪些是不拿学位的。因为都急匆匆地赶路,都一边吃比萨一边啃大书。

哈佛校园里的中国人不少。有一次几个中国人边走边议论前边几个美国人“老外”,那美国人笑了,用地道的中文说:在这儿你们才是老外呢!

我最常去的是哈佛广场的书店,喜欢那里的书卷气,佩服哈佛的生意经。玩具熊架上写着 Harvard University 的红背心,T恤打上哈佛法学院、哈佛商学院等的标记,各种帽子、书包、笔、本子、杯子、文件夹、工艺品都是哈佛、哈佛。打上了哈佛字样,就都一副高深莫测的模样。一只并不很大的绒毛熊,连税卖到大约19美元。为什么?因为是有身份有身份的熊,是哈佛熊。一只普通的茶杯,连税卖到大约16美元。为什么?因为是有品位有内涵有深度的杯,哈佛杯。

摘自《中华读书报》

总裁的面试秘诀

美国投资公司在新组建的亚洲商务区总部要招人,经过几轮残酷竞争,最终留下5个人。这5个人的综合素质差不多,如何具体分工,人事部门难以确定。

总裁迈克是个美国人,他想了想说:“最后面试由我来主持吧。”面试时,每人发了一张试卷,试卷上的题目都是一样的:请把“不用对对手怀有过多的慈悲”12个字,填在后面

的11个方格里。

迈克一边看交上来的试卷,一边现场进行了职位安排。他让交白卷的那位到企划部;在格子中只填写前11个字的到财务部;将12个字挤满11个格子的到后勤部;只剩“不用对对手怀有过多”9个字,在最后两格中写上省略号的那位到公关部;还有一位将“不用”浓缩成“甬”字,11个格填11个字的,迈克安排

他到文档处理部。

人事经理对此疑惑不解,迈克解释道:“交白卷的那位出于顾虑不肯轻易答题,说明他有极高的风险意识,这种做事深思熟虑的人适合去做经营策划;填了句子中前11个字的人比较刻板、保守,当然是做财务的最佳人选;把12个字全挤在11个格子中的,很有节约意识,应该去管后勤;至于后面用省略号,句子怎么理解都行,自然也包括了原来的意思,说明这人处世圆滑,善于交际,他理应于公关;将‘不用’浓缩成‘甬’的,是处理文件的高手。”

摘自《名人传记》

王安忆谈世博:

什么样的生活更幸福

世博会是国际社会交给上海的喜庆日子,同时也交给上海一份试卷,这份试卷的奇妙在于,由我们自己出题,然后由我们自己回答,要求却是明确的,那就是要给人生活的精神增添新的内容。

我们定的题目是“城市,让生活更美好”,我以为这是一个好题目,却也是一道难题。感谢世博会给予行动中的人们一个思考的时刻,审视我们的目标和理想,检验初衷,重新提出幸福的观念。

我的职业是写作小说,所以习惯在小说以及其他的虚构艺术中寻找社会生活的材料。老舍先生笔下的骆驼祥子,是一个农民,失去了父母和几亩薄地,怎么失去的?老舍没有说,那个时代,无非是灾荒和兵祸,于是,来到北京,到北京干什么?拉人力车,凭一身好力气,单打独挑,尚能活下去;矛盾的“林家铺子”,在江南小镇上,面对四乡八野的低消费,农业的萧条使得这微量的消费都压缩了,巨大资本进入,从根本上颠覆了小本经营,终于倒闭,破产的老板去了哪里?茅盾先生没有说,我想大概是去上海,上海地场大,需求也大,出路也就多;巴金的《家》,新青年觉醒,抱了满腔的热爱,要去拯救上世纪初腐烂的社会,结果连身边至亲的人都救不了,甚至他自己的那一份小小的爱情都没有保住,失望的觉慧离开了那个铜墙铁壁的家,乘船溯流而上,小说写道:“这水只是不停地向前面流去,它会把我载到一个未知的大城市去。”这城市叫什么名字,作者没有说,但是,我们都知道,巴金先生来到了上海;鲁迅先生的小说《伤

逝》,子君和涓生的自由结合,是发生在北京吧!他们那个同居的小家安在了吉兆胡同里,市井坊间虽然不免有闲话,可到底也不能过于干涉,最后的失败,是败在涓生自身的颓唐,他担负不起鲁迅先生对爱情的期望;多年之后,《青春之歌》里,林道静和余永泽也是在北京同居,一套中国式的小公寓,遗憾的是,由于政见不同,他们没有将这新式爱情坚持到底……我想说的是,城市的生产结构和生活方式,使得人们有能力走出传统伦理的秩序,放弃一切物质和精神的遗产,独立生存。换一句话说,城市是一个相对公平的空间,不仅是强者,弱者也可在一定程度上获取和实现自身的价值。

我们可略微回顾一下女性地位的转变——1900年,美国纽约成立“国际女装工人工会”,为女工主张权力,是国际“三八”妇女节的起源。这个初级的男女平等条约产生的背景,就是工业化,女性与男性不同量级的体力,在机器上消弭了差异。社会的现代化可说是随城市发展而进行,女性受启蒙受教育,在这个单纯依凭体力的世界焕发出各种潜能,越来越具备与男性竞争的条件。

再有,残障人的权益。这一个群体需要在高度合作的结构中,方能够自立后体现尊严。2007年,上海曾经承办过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,开幕式上有一个节目,是以诸多人体连成一道血肉长城,两名脑瘫残障者分别从两端攀上“长城”,向前攀爬,跋涉中,身下的“城墙”屡屡伸出手臂,扶助他们,推动他们,不

摘自《人民网》

名流故事

丘吉尔的机智和幽默

二十多岁时,丘吉尔当过战地记者。在南非,英军与布尔人交战,他被俘后,从牢笼里机智地逃脱了。布尔人悬赏二十五英镑,活捉他或打死他,两样都行。多年后,丘吉尔仍把那份通缉令装在镜框里,挂在书房中。他总喜欢用戏谑的口气对来访者说,“我只值那么几个钱吗?二十五英镑?”尚未发迹的伟大人物,其身价被如此低估,也是正常的。

丘吉尔曾跟一位朋友谈及生命的意义。他语调低沉地说:“我们大家都是虫子。”这话令他的朋友为之怔,紧接着,他又语调高昂地补充道:“不过,我的确认为我是一只萤火虫。”表面看来,丘吉尔有悖常情,但在人类的心目中,昆虫也是好坏参半的,蜜蜂固然比苍蝇高贵,萤火虫更是被尊奉为“光明使者”。丘吉尔抑人而扬己,他究竟是自大,还是自信?在二战期间,这只老“萤火

虫”确属黑暗世界中难得的光亮,希特勒放出“苍鹰”来,意欲啄灭它,也未能如愿。

丘吉尔对苏联一直抱有敌意,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。二战期间,他发表演讲,欢迎斯大林加入反法西斯阵营,立刻有人讽刺丘吉尔的政治态度转弯太急,他幽默地回答道:“假如希特勒侵犯地狱,我也会在下议院为阎王讲好话的。”学问家可以固执己见,政治家则必须洞察时局,因势利导。丘吉尔此言一出,那些自以为占据上风的政敌便顿失故垒。

英格兰国会中第一位女议员阿斯特女士私下请丘吉尔是“饶舌的大烟枪”,有一次,她对丘吉尔不无刻薄地说:“假若我是你的妻子,我会在你的咖啡里下毒!”丘吉尔针锋相对,从容反驳道:“假如我抑人而扬己,他究竟是自大,还是自信?在二战期间,这只老“萤火

四两拨千斤?丘吉尔做了很好的示范。丘吉尔还与另一位工党女议员贝茜·布拉多克有过口角上的较量。

某晚,丘吉尔在下议院喝高了,遇到膘肥体胖的贝茜·布拉多克,后者当即发难:“你喝醉了!瞧你这副模样,醉得令人恶心!”丘吉尔酒醉心明,幽默感丝毫不减,杀伤力甚至更强,他说:“贝茜,尽管我今晚喝醉了,明天早上就能清醒,可你就不一样,明天还是无法变成窈窕淑女。”这句话确实太噎人,足够贝茜·布拉多克狠狠地消化一阵子了。

英国剧作家萧伯纳曾让人给丘吉尔送去两张戏票和一张便条,便条上面“客气”地写道:“来看我的戏吧。如果你有朋友,就请带一个来。”他这话暗讽丘吉尔树敌太多,交友太少。丘吉尔心知肚明,回复时也打趣道:“首场演出我没空去。但我愿意第二天晚上去看,如果你的戏还演第二场的话。”丘吉尔的话踩中了萧伯纳的痛脚,那时后者的戏还没有大受观众的欢迎,能弄个首演已殊为不易。

摘自《今晚报》

一张叶莉的照片。波斯筒看到后说:“这孩子真坏。”我知道他其实是在夸奖我。

在我NBA的第一年结束后,叶莉还送了我一个挂在手机上的小熊,小熊里面有磁铁。她也有一个那样的熊,里面也有块磁铁。把两只熊放在一起它们就粘在一起。

很多记者都想知道为什么我选择了在火箭队穿11号,因为我在大鲨鱼队一直都穿15号,而且在我来之前也没有人用这个号码。那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号码看起来最像两个Y,就是姚和叶的Y。你很容易发现哪辆车是我的,因为车背后有车牌号和两个Y,而且车里的地毯上也绣了两个Y。我以前总说如果你发现我的球衣号变了,就表示我换女朋友了。现在看来,我连车也得换了。

全明星赛除了关于篮球,就是关于女人。我记得在比赛结束后一个记者问我:“这个周末你找到女孩子没有?”我说:“没有,我在中国有女朋友。”他听了很失望。我经常有这样的感觉,大家觉得我不去得到所有作为一个NBA球员可以得到的东西是犯了个错误。我喜欢看女孩子,但是一个叶莉对我来说足够了。

摘自《中外书摘》

ZHENGZHOU DAILY

编辑 李昆霞 电话 67655539 E-mail: zzwzbwh1616@sina.com

我和萨翁的故事

邓亚萍

我与萨马兰奇先生相识于1991年日本举办的第4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。当时,他由日本皇太子陪同观看了我与朝鲜李粉姬的女单决赛。只有18岁的我敢打敢拼,3:0获胜。颁奖前翻译对我说:“你知道一会儿谁给你颁奖?萨马兰奇!”

我睁大了眼睛问:“萨马兰奇是谁?”

颁奖后,萨马兰奇笑着说:“我请你到国际奥委会总部做客。”我只礼貌地同声:“谢谢!”

直到数月后果真成行至瑞士洛桑,萨马兰奇宴请时说:“你是全世

界第一个被我正式邀请来国际奥委会总部做客的运动员。”我才终于明白这一邀请的分量。就是在那次吃饭时,他向我提出了要求:“你要学英语。”还说,“我认为你是最好的运动员。”明年在我的家乡巴塞罗那举办第25届奥运会,乒乓球决赛是哪天?我去给你颁奖。”安妮马上拿出赛程表,说了日子。萨马兰奇随之从西服口袋里掏出本子,认真记上。

老人给我颁奖,前后共5次,最难忘的当然是1996年奥运女单决赛。记得赛前我正热身,领队忽然对

我说:“小邓,你外公来了!”“外公?谁是我外公?”“萨马兰奇啊!”我这才看到,萨马兰奇已与夫人一同坐在主席台上。

这次比赛真是一波三折。我与中华台北队的陈静直到打满5局,我才以21:5获胜,蝉联了奥运冠军。赛后我哇哇大哭,电视台采访时我还泣不成声,只是说:“太难了,真是太难了……”大概是看见了我的满脸泪痕,又亲眼见证了冠军的来之不易,颁奖时连人才笑着轻轻拍了一下我的面颊。这一拍,竟成经典瞬间,广为流传。

我忘不了,2001年申奥成功后在莫斯科举行的招待会上,老人特意走到我面前,笑着问:“你高兴吗?”“当然!”我也笑着回答,看到的是和中国人一样的一脸欣慰。

摘自《人民日报·海外版》

就这样,我成了东方不败

林青霞

我刚到化妆间就听说十几个临时演员都冷得跑了。大家推举我打电话给徐克:“导演,天气太冷了,又下雨,临时演员都跑了,还拍不拍?”“下刀子都要拍!”徐克导演这样说。

到了现场才知道我得站在高高的树顶上,表示东方不败武功高强。武术指导把两条“威亚”穿过头衣服,扣在戏服里绷得紧紧的威亚衣上。“一!二!三!拉!”我上了树。个把钟头后才听导演喊“预备!开风扇!放鸽子!Action!”一大群鸽子朝我这儿飞,“啪”的一声,一只鸽子打在我脸上,脸滚烫。我心里想千万别眨眼,忍着点,挺起胸来扮威武,否则重拍更辛苦。结果因为鸽子没演好还是得重来——这是东方不败的出场。

十六年后居然有人跟我说,那天晚上,把我吊在树上个把钟头,是武术导演在整我。还好当时我不知道。

东方不败练功。沙尘滚滚。

我在沙滩上,张开双臂奋力向前奔,大风扇吹起红水泥,银幕上的我神勇威武,银幕上的我灰头土脸。

东方不败要从海面升上来。拍这场戏前一晚,我告诉自己一定要早睡。

但是,电话铃响了,是杨凡找我打麻将。“不行!今天我要早睡,明天早班要下水。”“拜托啦!三缺

一。”打了四圈,到十二点我坚持要走。其他三家千求万求地不让走。好吧!勉为其难,再打四圈,就这样四圈又四圈,一直到天亮六点才“收工”。

我拖着疲惫的身子,觉也没睡就到了拍戏现场,化好妆准备一会儿下水。左等右等还没轮到我,也不敢睡觉。直到黄昏才叫我穿上戏服。

海水里,几个武行拿着灭火器制造水泡,表现东方不败的爆炸力,一台液压升降机让我站在上面手扶着杆子,稳稳地浮出水面。“预备!开机!”几个灭火器开启,水面咕嘟咕嘟的,像煮开的水,我抓着升降机,还没到水面,假发就给升降机夹住了,吓得我猛往上蹿,生怕上不来给淹死。

导演以为冒出水面的,会是一张美丽的脸孔,没想到出来的是一张恐怖扭曲的脸。

天马上就要黑了,再戴假发也来不及。我提议,不如把我的长发往后拢一拢拍好了。灭火器也因为效果不佳而取消。结果在夕阳的余晖下,东方不败由平静的水面缓缓上升,配合着强劲的音乐,反倒成了最美最自然的一个画面。

《东方不败》最后一个镜头又是黄昏,又得赶拍。武术导演手举着笨重的摄影机,因为要拍出东方不

败死前掉下山崖最后一瞥的眼神,摄影机必须配合演员转动。时间紧迫,这个镜头要在太阳下山之前拍成。武术导演心浮气躁地一边调整焦距,一边移动脚步,踩得碎石沙沙作响,嘴里还骂着粗话。在这兵荒马乱时刻,我告诉自己要镇定,要镇定,这个镜头很重要,千万别受环境影响。于是我整一整假睫毛,滴上眼药水。我说:“来!”“ROLL机!”我含着眼泪,带着东方不败复杂的情绪,微笑着跟着摄影机转半个圈。这三秒钟的眼神让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电影终于杀青了,导演徐克设宴在福临门。我举杯敬导演:“好高兴哦!这部戏终于杀青了。”“你明天几点上飞机?”徐导演问。我心里正以为导演对我关心而感到温暖。我说:“十一点。”徐克说:“明天九点通告,加拍一个东方不败出场特写。”我还没高兴完,马上又收起笑容,相信我的表情一定很滑稽,徐克忍得很辛苦才让自己不笑出来。

结果东方不败出场的第一个镜头,是由树林里飞出来,脸上的面具因为穿过林子,被枝叶刮掉而见到他的真面目。被在脸上绑着“威亚”,等飞到镜头前就拉走。幸亏我运气好,没拍划花脸。

孟子云: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,必先苦其心志,劳其筋骨……”上天虽不至降大任于我,至少我得担得起“东方不败”的称号。

《东方不败》的票房,是做梦都梦不到的好,所有的辛苦都变成了甜美的回忆。

摘自《南方周末》

我要一个叶莉就已足够

姚明

我平生只跟一个女孩谈过恋爱,那就是我的女朋友。

第一次见到叶莉的时候,我17岁。她在女子国家队里训练。但那个时候,我没有跟她说话,也不想在我进入国家队之前就约她出去。但是只要可能的话,我会向报社的摄影记者要女子国家队的多余照片。

在1999年我终于进入了国家队后,我约叶莉出去玩。

她约不行。

这并没有让我放弃。

在一年后,我注意到她有点变化。在接下来的6个月,她还是说“不”,但是没那么快了。

“好,我对自己说,‘有点改变了,我现在有机会了!我会继续等待。’”

我没有放弃是因为我感觉到她就是我的那一半。

现在回想起来,我知道为什么一年后事情有所改变,一切都是从悉尼奥运会开始的。悉尼奥运会是我第一次参加奥运会,我拿了很多纪念章同每个国家代表队的教练员

和运动员进行交换。我大概搜集了200个不同国家不同运动的纪念章。

我挑了其中50个最好的送给了叶莉,作为她19岁的生日礼物。这就是为什么她最后会对我的态度软下来。

在一次由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为上海所有的球队(包括男子、女子足球队和篮球队)举办的晚宴后,叶莉终于答应和我约会了。我向参加晚宴的所有人保证,我们会赢得下一个赛季的总冠军。吃完饭后,我和叶莉聊了会儿天,然后去了酒吧。那是个很甜蜜的夜晚。

在我的最后一个CBA赛季开始的时候,她送给了我这个红绳结。那一天是2月14日,情人节。这个结在新的时候颜色是深红深红的。她也有一个,两个都是她自己做的。她的看上去新一点,因为我打的比赛比她多。比赛越多意味着汗水和冲杀也越多。我的戴在左手,她的戴在右手。

红绳结不是人们知道我有女朋友的唯一方式。我的手机屏幕就是